

广搜慎考 精撰新史

——《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读后

吴在庆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傅璇琮先生的《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是一部晚唐翰林学士的传记新著。此书从众多的典籍中进行耙梳整理,广搜慎考,纠正了众多典籍史料记载的错误,整理排列出晚唐 81年间 150余位翰林学士的事迹传记,其中对旧史籍指瑕纠误,又多所发明,提供给学界一部晚唐翰林学士的信史。

关键词:晚唐;翰林学士;广搜慎考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09)04-0111-02

收稿日期: 2008-12-20

作者简介:吴在庆(1946-)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傅璇琮先生继《唐翰林学士传论》之后,其姐妹篇《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下简称《晚唐卷》)又由辽海出版社于 2007年 11月出版了,一部唐翰林学士传记的新史著终于圆满完成。

《晚唐卷》是从唐文宗朝至唐昭宗、哀帝朝共 81年间 150余位翰林学士的传记(书末又制有 81年间的《唐翰林学士年表》),其所考论翰林学士数量之多是盛中唐的两倍多,故仅从数量上说,此书较前广受赞誉的《唐翰林学士传论》用功尤多,更有令人钦佩者乃在于由于晚唐史料的杂乱与错讹尤甚,而有关晚唐翰林学士的记载也较为欠缺,故要条分缕析有序地清理撰写出这数量众多的翰林学士事迹又谈何容易!但也因此,此书更显出作者广搜慎考,精于结撰的深厚文史研究功力,以此《晚唐卷》给翰林学士的立传几乎均是建立在对旧史籍指瑕纠误、精确综合考辨众说的基础上的,故其发明更多,特色与贡献尤著。

我们举例看看晚唐史料错讹之甚,为翰林学士立传之难。

张文蔚曾为翰林学士,后为翰林学士承旨,传

见《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然记载多有误。《旧五代史》本传记他于乾符二年登第后仕迹有误,云:“时丞相裴坦兼判盐铁,解褐署巡官。”^[1] (卷 18)然《新唐书·宰相年表》载:乾符元年二月癸丑,“检校户部尚书兼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五月乙未,坦薨。”^[2] 《新唐书·僖宗纪》、《资治通鉴》卷五二五所记同。且《新唐书·裴坦传》亦记其由华州刺史“召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数月卒”^[2] (卷 182),与《新唐书·宰相年表》、《资治通鉴》合。由此,则裴坦于张文蔚进士及第前一年,已任相,并卒,《旧五代史》本传所记显误。又《旧唐书·张文蔚传》记其“乾宁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赐紫。”^[3] (卷 178)而《旧五代史》本传所记不同,云“拜司勋郎中、知制诰,岁满授中书舍人”,未记其任祠部郎中。然清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祠部郎中记有张文蔚名,且《文苑英华》卷四一九有刘崇望《祠部郎中知制诰张文蔚母扶风郡太夫人苏氏封冯翊郡太夫人等制》,则其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时其母尚在世。《旧五代史》

本传云：“拜司勋郎中、知制诰，岁满授中书舍人。丁母忧，退居东畿。”由此可见，谓其任司勋郎中乃祠部郎中之讹。又《旧唐书》本传未记张文蔚曾任翰林学士承旨，而《旧五代史》本传记“召入翰林，为承旨学士”，后转为户部侍郎。《新五代史》本传则云“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承旨”^{[4]（卷34）}，未记时日。为了考清楚其任承旨时间，作者通过《旧唐书·柳璨传》、《新唐书·宰相年表》、《资治通鉴》及其《考异》等，辗转考清其任承旨在天复三年下半年，时为户部侍郎。前所述仅是张文蔚的几任仕迹，而其其他多任仕历均如前所述之多分歧讹误。尽管如此，《晚唐卷》终于一一考清，为其立传。此诚如作者在《前言》所说：“本书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 29 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 26 人，而所记有误者则为 23 人……，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如懿宗朝杨收，两《唐书》纪、传所记，有七、八处讹误。”因此诚如作者所言“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小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我以为其特色与贡献起码有以下四方面。

特色与贡献之一，即是《晚唐卷》考辨纠正了新旧《唐书》等史籍的众多讹误错漏，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晚唐士人和翰林学士的可信史料记载。如上所述，《晚唐卷》为张文蔚立传即纠正了包括两《唐书》在内的众多史籍的讹误，而其为一百五十余位学士立传，每位又常牵涉到多位历史人物，则其纠正两《唐书》等史籍的讹误数量当是极为众多的。更需指出的是，两《唐书》等史籍的讹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为了考清某事或某人的仕历之误而综合众多史籍、诗文、碑志、方志、笔记等而慎加比勘考辨，是难于发现并搞清楚的。因此《晚唐卷》为众多学士立传而逐位逐事进行考察，其所纠正的讹误当是最为深入而确当的。因此凡是引用两《唐书》晚唐士人、翰林学士仕迹的，最好当参酌此书所考，以免从讹而不察。

特色与贡献之二，即辨清史载对不少文士的误记，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观点。史籍所载翰林学士与文士往还事迹时亦多有不实者，这一直影响到今人的研究。《晚唐卷》在辨析清理他们的生平时，多有纠正旧说，辨明事实真相，从而开辟

了研究的新视角。如两《唐书·李商隐传》等记有李商隐因先后为王茂元、郑亚从事，故令狐绹“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晚唐卷》在辨析多种史籍对令狐绹生平仕历多有误载的同时，又据两人的来往诗作表明“令狐绹于外任湖州刺史及内任翰林学士及居相位时，均与李商隐有交往，并有所举荐。李商隐则数有诗奉呈，屡表请举之意。二人并无所谓牛李党争之嫌。”又如因《李群玉诗集》、《全唐文》均有令狐绹《荐处士李群玉状》故后人亦有以为李群玉为弘文馆校书郎乃令狐绹所荐举。然唐宋载籍早即记乃裴休所荐，两说并行而莫明其真实关系。《晚唐卷》则就现有如李群玉《始忝四座奏状闻荐蒙恩授官……》之诗题等有关材料细加清理，得出“此荐状虽列令狐绹之名，实出裴休之荐，但令狐绹当时在宰臣中因居首位，当也具见其荐力。”这就理清了荐举李群玉的歧说。

特色与贡献之三，即开辟了翰林学士与科场举子、文学家关系的研究课题。由于翰林学士的特殊地位，且不少翰林学士如王起、封敖、沈询、郑处海、吴融、韩偓等本身即为著名文士，他们不仅有诗文之作，而且与不少举子、文士多有交往唱和，举子文士们也多有向他们献文求荐者，因此《晚唐卷》在记叙这些翰林学士的事迹时多提及他们的创作及其与当时文士的交往唱酬行卷关系，如前所提及的李商隐与令狐绹，以及令狐绹与赵嘏、吴融与韩偓的唱和，刘得仁、张蠙之分别向翰林学士丁居晦、） 裊、萧遘献诗求荐等。这正是作者在《前言》所指出的“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卷》即抓住了这一特色，时时加以记叙，从而为我们引出并开辟了翰林学士与举子、文学家关系的研究新课题。

特色与贡献之四，即清醒的问题意识，并以此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言“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晚唐卷·前言》），作者也确实是这样做了。在进行这多方面的探讨时，作者常在所记叙的某种现象时，敏锐地提出颇富提炼与启发性的问题，提请进一步（下转第 119 页）

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王巍《辽代著述研究》张希清辑录的《涑水纪闻》佚文与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中的有关西夏资料,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李昌宪关于西夏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成果等,皆予以科学、合理地汲取。这些新成果的利用与吸收,增添了是书的新意。总之,翔实的资料,使此书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

四

是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略举一二。

一是某些问题的分析不够透彻。虽指出“晁公武、马端临、陈第三人的分类非但不合理,还带有封建正统的史学观念”,但对其分类不合理的原因并没有深入探究;对诸多御夏议边的文献,只是罗列出数种,但缺乏透彻分析,没有将御夏议边文献的出现与时代、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

二是说法过于武断。如对《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刘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踰廓州”,出使青唐的路线,认为“沈括记载有误”。刘涣从古渭寨出发,其行程为熙州(治今甘

肃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路线,至河州境内国门寺渡河后,既可从湟州沿湟水河谷进入青唐,也可沿黄河西行经米川城、廓州、宁塞寨、肤公城、绥平堡、龙支城,然后进入青唐,这既是一条宋时进入青唐的通道,也是一条传统的东西通道。作者认为渡黄河后经廓州再到青唐,即“沈括记载有误”,这种说法太武断。

三是个别地名有误。如“鄯州即邈川城”(第35页),将鄯州与邈川等同。鄯州与邈川是两个不同的地名。鄯州即西宁州(治今青海西宁市),旧青唐城,乐州原为邈川城,后改为湟州。

四是部分资料有遗漏。有关汉文西夏文献资料搜集不全,如明刘凤《刘子威杂俎》卷3《地贞篇下》有李茂贞、李仁福记载。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7《四裔考·西夷》有党项、西夏的记载,王圻《三才图会·地理》卷16《宋朝元丰九域图》、《宋朝化外州郡图》、《天象分野图》,皆有关于西夏的信息,将并丰、夏、盐、银、宥、灵、会、兰、甘、凉、瓜、沙、肃皆标注在图内。这些汉文西夏文献资料并没有在是书中有所反映。

总之,胡玉冰先生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在前辈学者基础上的创新。期望作者不断奋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 方建春]

(上接第112页)注意与研究。如指出“另可注意的是,晚唐翰林学士在职期间,除撰写制诏等官方文书外,还编撰与时政有关而又具有文献价值的著作”,“晚唐时翰林学士也有一种反面现象,即宦官对翰林学士起相当大的作用”,“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有政见,颇值得研究”,“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却为过去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就《东观奏记》所载,宣宗乃不满萧■以沈约之诗与其相比,乃‘恩遇渐薄’,终使出院。这一记述,对于翰

林学士之处境,也值得参考。”如此等等概括与提出问题,均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方向。

仅从以上四端可以见到,《晚唐卷》不仅在广搜慎考中为众多的晚唐翰林学士们立传,按时序完整绘制了晚唐翰林学士们的翰林经历画卷,而且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识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历史问题,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它实在是一部可信的颇富学术价值的唐代翰林学士的新史著。

参考文献:

- [1]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安正发]